

以研修凝共識 以協同強管治

議事廳

鄧飛

行政主導體制是基本法確立的香港核心憲制安排，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制度支柱，也是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鞏固由治及興新局面、邁向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立法會先後完成兩項具有標誌意義的管治建設工作：一是7月19日赴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參與專題研修，成為回歸以來首次立法會議員北上系統學習國家治理與特區管治；二是7月28日立法會全體議員與行政長官舉行深度交流會，建立行政與立法常態化、制度化的溝通協作平台。

一學一談，相輔相成。前者着重統一思想、深化憲制認知，後者着重完善機制、提升協同效能，共同推動行政與立法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動關係，為進一步鞏固和優化行政主導體制奠定基礎。此次北京研修內容涵蓋國家治理體系、憲法與基本法、國家安全、國家發展戰略以及港澳治理新格局等重要課題，兼

具理論、政策與國情教育，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行政主導能否有效落實，關鍵在於整個管治團隊是否牢固樹立正確的憲制觀、治理觀和大局觀。香港過去一段時期社會動盪、行政立法對立、政策推進受阻，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議政力量偏離憲制定位，把議會變成政治對抗的平台，造成施政停滯和社會內耗，削弱了整體治理效能。

立法會履職理念的系統提升

因此，立法會議員北上研修，不只是一次學習交流，更是一次對立法會整體履職理念的系統提升。透過權威、全面的國情與憲制教育，議員們更加清楚理解香港作為中央直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定位，理解行政長官依法統籌施政、承擔主要管治責任，而立法會則依法履行立法、監督、審批公共開支及反映民意等職能，既監督政府，也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從思想層面進一步鞏固行政主導的制度基礎。

如果說北京研修重在凝聚共識，那麼7月28日行政長官與全體議員交流會，則重在完善行政立法協作機制。交流會聚焦提升管治效率、優化行政立法互動，以及破解民生與發展難題，體現行政主導體制下行政與立法既分工明確、又密切協作的治理理念。行政機關掌握整體施政資源，負責政策制定與統籌執行；立法會則具有廣泛界別代表性，更貼近社會和基層，可在政策完善、民意反映及凝聚共識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過去行政立法互動較多停留於法案審議、質詢及撥款等程序層面，事前溝通不足，容易導致政策推行過程中出現誤解或磨合成本。建立常態化交流平台，意味行政機關可更早介紹政策思路和執行難點，立法會亦可及早反映民情、提出建議，令政策制定更加貼近社會需要，提升行政主導的整體效能。新時代立法會應更加準確把握自身憲制角色，以專業、建設性和大局觀履職，全

方位支持行政主導體制提質增效。

同一支「香港隊」的分工合作

首先，要堅守憲制本位，以建設性履職支持政府施政。議員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原則，把正確憲制觀落實於法案審議、財政審批和議案辯論之中，摒棄政治對抗和界別本位思維，聚焦香港整體利益，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科產業發展、土地房屋供應、青年發展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重點工作。

其次，要發揮橋樑作用，以民意匯聚賦能行政施政。行政主導的生命力，在於回應民心、改善民生。立法會應深入社區，持續收集住房、教育、醫療、就業、交通等方面的民意，向政府提出務實建議；同時做好政策解說與社會溝通，協助凝聚共識，營造有利施政的社會氛圍。

第三，要強化協同管治思維，以高水平配合提升治理效能。行政與立法是

同一支「香港隊」不同崗位的分工合作。立法會既要依法履行監督職能，防止施政偏差、資源浪費和程序疏漏，更要堅持建設性監督，以完善施政、改善民生、促進發展為目標，做到監督而不添亂、建言而有質量、配合而有力，形成行政善規劃、立法善完善、社會共推進的良性治理格局。

總而言之，七月的北京研修夯實了行政主導的思想基礎，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全體議員交流會則完善了行政立法協同機制，兩者相互配合，共同鞏固了香港行政主導的制度優勢。

展望未来，立法會應持續深化學習成果，完善協作機制，提升履職水平，堅定維護行政主導體制，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斷提升香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推動良政善治制度化、常態化，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續寫長期繁榮穩定的新篇章。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推動五年規劃從編制到落實

議事論事

常樂

當前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已近尾聲，而規劃的執行即將提上日程。自2月行政長官提出編制首個五年規劃以來，各界專家及社會輿論大多聚焦香港編制實施五年規劃的重大意義、香港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銜接、國家規劃涉港部署的落實以及香港五年規劃編制的重點、原則和需處理好的重大關係等等議題。上述議題都很重要，都涉及到如何編制出一份全面、系統、科學、可行的五年規劃，確保規劃既能符合香港實際，又能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應該說，對於這篇文章而言，香港社會各界紛紛建言、集思廣益，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

立足國家大局 轉變施政思維

藍圖貴在實施。毋庸置疑，對於特區政府而言，編制五年規劃史無前例，而實施五年規劃更是史無前例。從某種程度說，編制規劃比實施規劃相對容易，後續規劃的實施見效必然面臨多重挑戰。萬事開頭難。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既是編制規劃的主體，也是實施規劃的主體，必須克服萬難，勇毅前行，取得最佳建設效果。相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這裏僅就行政技術的層面談點兒支持五年規劃順利實施的學習體會。

首先，順利實施規劃，必須做到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時指出，25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只有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才能確保「一國兩制」

事業始終朝着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其中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習近平主席強調，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好。2024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澳門時也指出，香港、澳門回歸以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需要把握好4條。其中第一條就是要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要始終堅持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一切，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而此次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實施，從行政權力配置和權力實施效果看，就是國家治理優勢向香港特區的擴展和延伸，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銜接，從而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循此權力配置視角，下步香港特區要順利實施好五年規劃，必須立足國家大局，轉變施政思維，積極學習內地規劃治理經驗，主動對接聯繫國家規劃治理機構，充分吸收國家規劃治理和規劃引領紅利。

其次，順利實施規劃，必須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中共二十大以來，「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總體進入新階段。這一新階段有兩層內涵，一是自此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二是伴隨着國家正處於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

入了新階段。

但是歸結為一點，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香港的發展道路、發展目標、使命任務等都更加清晰明確，就是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面對新使命、新任務、新貢獻，香港隨之也面臨最大的發展短板，就是治理效能的提高問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視察香港時強調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指出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並進而對特區政府官員的素質、思維、作風等提出全面要求。

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要把香港治理好，必須堅持實行行政主導體制，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和相關法律履行職責，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在二十大上，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堅持行政主導，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制水平。2025年12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報告時強調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在「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編制實施好五年規劃，必須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這是因為行政主導是基本法設計的特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原則，根源於國家憲法，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制度保障；回歸近三十年的行政主導成功實踐，也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下步，香港社會各界要把行政主導堅持好完善好，不斷提升特區治理效能，推動「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取得更大成功。

最後，順利實施規劃，亦需考慮優化執行制度或機構。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實施對於任一政府的施政而言，都是震動式的、轉折式的，這一震動與轉折，首先是思想思維層面，其次是機構設置層面。比如，在新中國頭三年恢復期過後，從1953年開始將進入「一五」計劃建設時期。而中央認為「這是一個空前複雜的艱巨的新任務」。「擺在我們面前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任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來保證這個任務的完成。」

系統完善架構 強化配套機制

因此，從1952年起，中央就着手做了很多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準備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調整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議》，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關於調整省、區建制的決議》《關於增設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議》，這些決定和決議，都是為了適應1953年即將開始的全國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為了加強「中央人民政府對各項工作的領導」和加強省、市人民政府的組織與領導責任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政權建設工作中的

一次巨大的建設性的改進。眾所周知，為着加強國家計劃經濟的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於此時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

再如，澳門特區為了編制實施好其「一五」規劃，也調整和新設了一些政府機構，如2015年10月為制定首個五年規劃及統籌相關政策而特別設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2018年9月將原政策研究室和行政長官辦公室內地工作小組合併重設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委員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委員會、「一帶一路」建設委員會等。

故而，香港特區政府也需在這方面提高認識，研究調整完善行政機構，保障行政機構與建設任務的匹配性和有效性。要知道，香港特區雖沒有多層級政府妨礙集中領導，但是「小政府、大社會」理念和慣性下的「耗散型」權力配置模式，也不利於權力的集中與行使，難以發揮規劃治理所需要的統籌與合力。

總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責任在政府，而其實施，責任亦在政府。而中央多次要求香港所做到的依法提升治理效能，首要責任也在政府。這就需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要真正肩負起香港當家人和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的責任，健全治理機構，完善治理體系，引領全社會樹立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理念，以優良治理效能保障首個五年規劃實施，從而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法國「特朗普化」中國如何應對西方？

看世界

宋魯鄭

7月7日，巴黎上訴法院裁定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候選人勒龐有資格參選2027年總統，隨後民調顯示其支持率高於所有競爭對手。至此，法國變天將成大概率事件。這也標誌着歐洲進一步「特朗普化」，以及西方徹底進入民粹主義時代。但這對中國來說，也有可能是一種機遇。

極右的政治立場對內是反移民、反建制、反歐盟，而且沒有傳統價值觀包袱，相對務實。對外則奉行自我優先，反對捲入國際事務，也不認同當下的國際秩序。這一方面導致西方內部的混亂、分裂將進一步升級，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代價進行調適，從而減弱針對中國的壓力甚至無暇顧及，同時有機會令東西方長期產生衝突的價值問題消失或者邊緣化，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

從改革開放的歷史角度看，中國已經面臨多次類似的外部環境。一是打開國門之初，中西方是冷戰時的盟友，支持中國發展符合西方利益。西方的資

金、技術、市場乃至軍事都對中國開放。二是冷戰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再無競爭對手和挑戰者，因此奉行自由主義霸權：在世界推行它的制度模式、積極推動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構建和尊重國際制度，力圖使美國的競爭優勢和利益迅速遍及全球。所以雖然此時中國已經不再是一般定義上的西方盟友，但美國要以接觸促改變，所以仍然獲得相對良好的外部發展空間。同時美國的戰略擴張導致自身深陷多場反恐戰爭，注意力不僅從中國轉移，而且還需要中國的支持。

未改變西方戰略競爭本質

但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單極世界日益難以維繫，奧巴馬時期即開始進行亞太轉移，中國成為全力遏制對象。儘管如此，以拜登為代表的建制派和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派對中國政策的效果有明顯不同。建制派發揮價值觀牌和盟友派的優勢，對中國進行戰略性圍堵；民粹派則單打獨鬥，願意交易，而且僅聚焦中國最具韌性的經濟領域，讓中國可

以較從容應對。

但這也不代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衝突，或面對的挑戰將完全消失。一方面，中西方關係緩和不是因為西方想跟中國「和好」，只是因理念的改變，導致對中國的遏制力度下降，現有的衝突本身並沒有消失。二是未來的遏華手段或許不再有道德包裝，完全以「皇帝的新裝」示人。過去美國攻打伊拉克，還要編造理由是為了推進民主，還試圖要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現在據委內瑞拉總統和攻打伊朗則完全無視聯合國，直接行強盜所為。這也代表新形勢下西方民粹的行事方式，可能將沒有任何制約因素或者底線。

極右上台並沒有改變東西方的戰略競爭和西方文明的本質，因此，對西方這一對手的清醒認識仍是必不可少。從1840年算起，中國和西方打交道的時間不算長，最初中國由於長期落後，處於西方大國角逐的邊緣，因此對西方的認知稱不上全面和深刻。現在中國走到世界中心，東西方的博弈已經成為當今及未來相當長時間國際社會的主線，對中

國有利的應對方式其實很簡單：坐看西方內耗、自損，同時繼續理頭發展，盡量不捲入衝突，更重要的是深刻吸取歷史的教訓。

保持戰略定力專注發展

不妨看幾個歷史關鍵時刻的例子。1941年6月二戰進入最殘酷的時期，當時的參議員、後來的總統杜魯門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說：「如果我們覺得德國要贏了，我們就應該幫助俄羅斯，如果俄羅斯要贏了，我們就應該幫助德國，這樣就能讓他們盡量相互廝殺」。如果看看今天，西方對烏克蘭衝突的立場豈不也是這種理念的延續？2023年2月以色列前總理納塔夫利，貝內特接受媒體採訪時爆料，他在衝突之初進行斡旋，曾成功令雙方讓步，但和平進程卻被美英等國為了打擊俄羅斯而否決。

1941年8月，美國和英國發表《大西洋憲章》，提出不謀求擴張、民族自決等主張。但與此同時美國聲明，這個憲章對自己的門羅主義沒有約束力。英

國則聲明這個憲章也同樣不適用於它的全球殖民地。公然的雙重標準就是為了用來約束它們的對手。西方冠冕堂皇的理念和自私自利的行為之間的巨大反差，通過今天極右執政更加凸顯出來。比如美國可以在和伊朗談判期間對之發動斬首行動和全面戰爭。美國對中國禁售芯片，卻指責中國打稀土牌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歐洲和中國之外的國家也有數千億歐元的貿易順差，卻獨獨指責中國的順差會摧毀歐洲的工業。

從歷史的角度，西方文明器物層面的創造力和價值觀理念的包裝能力使得世人往往忽視其本質，中國不能不提高警惕。這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還由於中國是以「仁」、「義」為核心理念的儒家文明，更易在道德層面對西方包裝的價值理念產生共鳴，然而現在中國已處於和西方博弈的第一線，再不能誤讀西方文明。但至少可以說，今天極右崛起的西方更少欺騙性，更易於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對之有客觀的認知。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